

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特点

陈发水

(辽宁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 要:马克思主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对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国情和实际相结合。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庄严而神圣的历史使命。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国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理论品质,不断结合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社会变化发展的实际与特点,实现理论创新,又体现了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展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立与发展的历史特点。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形成与发展 历史特点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2)03-0053-07

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思潮传入中国,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结合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和时代特点,践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神圣使命,进行理论创新,从而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

一、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又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凝结了全党的集体智慧,是中国共产党行动的指南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大胆解放思想,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结合中国变化发展的实际,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经验的必然结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

(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贯穿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过程的主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使之成为我们了解新情况、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的思想武器。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注重对国情的了解,同时强调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

收稿日期 2012-02-26 修改日期 2012-03-26

作者简介 陈发水,男,河南驻马店人,历史学硕士,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及中国近现代史。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专项课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疑难问题研究”(09JDSZK013)。

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并且,“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2〕。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4〕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新道路,探索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路径,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步胜利。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环境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坚持解放思想,强调实事求是。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5〕同时邓小平还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这就必须研究本国的特点。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6〕“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7〕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命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的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入一个新的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适应新世纪世情、国情和党情的重大变化,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观点,尤其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新时期新阶段,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当前国情、党情以及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新变化,从我国当前的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大胆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发展战略思想,从不同层面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适时地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形势下的最新发展。

(二)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优秀理论品质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的不竭动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优秀理论品质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在立足中国实际,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基础上,由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开拓创新而形成和发展起来,并随着我国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社会实践不断发展,要求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必然要迅速更新。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8〕“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观点,悲观的观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9〕毛泽东还深刻地指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10〕民主

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客观实际出发,冲破种种被奉为主臬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羁绊,尊重真理,勇于创新,在近代中国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新道路,并取得了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建国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过渡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地在中国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与发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这一优秀理论品质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了崭新的历史发展时代。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新时期的新情况和新特点,放眼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全球趋势,面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国际态势,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认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以及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得失的基础上,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过程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优秀理论品质,不断开拓创新的结果,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的国际国内新形势,尤其是面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自身的基本情况,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新阶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世纪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势头,审时度势,求真务实,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认真总结了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在党的十七大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科学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的历史性发展。可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体现了实践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坚实基础。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中,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以及中央文件选集等以及胡锦涛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都是这些理论成果最集中的体现。与此同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也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并且,在党的历史上,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并对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的党的重要文献,也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凝聚了全党集体智慧。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而且是中国人民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1]并且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

进行民族复兴的伟大社会实践中,正是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国的社会实践,才取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长期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任何不顾时间、条件、环境的变化,割断历史,断章取义,望文生义,机械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和方法来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二、既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又立足国情,并结合东方大国的历史文化,以满足人民根本利益为归宿,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伟大的人民性和民族性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把握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立足国情,并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而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中国人民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体现了伟大的人民性和民族性。

(一)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以满足人民的利益要求为根本出发点,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人民性

人民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足点。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 90 多年奋斗的光辉历程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卓越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在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以满足人民的利益要求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人民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立足国情,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无不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我国的具体实际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以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为手段,以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为保障,以满足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其科学体系的基本内容无不反映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观点。同时,毛泽东也充分肯定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13〕“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正是由于强调了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突出了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才最终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大胜利。

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环境、新形势和新任务,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科学判断迅速变化发展的国内外形势,深刻总结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等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人民性是贯通这一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邓小平理论着眼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我国初级阶段的基本价值目标,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眼于新形势下党的自身建设,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14〕“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15〕“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6〕并努力使最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科学发展观则着眼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切实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的伟大作用,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创新的进程中,这一理论才能够大放异彩,永葆其生机和活力,并展现出其伟大的人民性。

(二)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实际出发,并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在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不同时期的实践、同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紧密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文化的土壤之中,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易于接受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为中国人民所理解、认同和掌握,并转化为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是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结晶,然而,就文化范畴来讲,马克思主义毕竟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作为客观真理,它对各国的革命实践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是,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实际和国情结合起来。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17]毛泽东也就此做过深刻的论述,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8]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思想文化,要为人民所接受,化为中国人民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发挥其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指导作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绝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9]。20世纪30年代曾在陕北延安访问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观察到民主革命阶段,中共运用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点时,认为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借用的过程中也有不少改动,俄国的思想和制度很少有不经大加改动以适应具体环境而仍存在下来的。十年的实际经验消灭了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进口的做法,结果也造成苏维埃制度中带有完全是中国式的特点”^[20]。毛泽东于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解释,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等都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的特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国情,从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并对中国文化予以认真地清理,汲取精华,去其糟粕,以中国优秀文化的表达方式,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语言表现形式,深入浅出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反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民族性。

三、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反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立、发展与创新的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优秀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与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内容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贯穿其中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与科学精神,反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同时,由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各个理论形态产生的历史生态环境的差异性,客观上又决定了它们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带有各个不同时代的典型特色。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各个理论形态是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体现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虽然其各个理论成果所处的国际环

境、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不尽相同,但它们所遵循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体现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严整的整体性。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各个具体的理论成果在创立、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都立足国情,从实际出发,既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行动的指南,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既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又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圭臬,教条式的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个理论成果是一脉相承的。正如抗战时期,曾任美军观察组成员,后致力于汉学研究的美国前外交官谢伟思 1984 年 12 月看到美国《纽约时报》依据当时《人民日报》社论内容所发表的文章说中国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后,认为《纽约时报》的文章是肤浅的,因为今天的政策与延安时代的政策是有连续性的,只“不过是在延安时期就孕育了的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前后一致的发展。”^[21]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当看到西方对中国的误判和对江泽民的曲解屡屡发生时,美国学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其长期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江的思想是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他要使这一思想成为 21 世纪的指导思想。”^[22]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才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两次结合”,才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次又一次理论飞跃,才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与时俱进,也因此才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中,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并在此基础上,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并在引领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各个具体的理论成果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近代以来,随着列强的侵入,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此,国家独立、人民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但是中国仁人志士的夙愿,而且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毕生追求。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贯穿着这一伟大的主题。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人以之引领中国取得了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实现了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解放。社会主义本质论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详备地论述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价值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重阐明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更好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何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并使其能够胜任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科学发展观则从发展理念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时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思想。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立足中国国情,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在一定历史时空范围内的具体运用和体现,解决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以及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的基本矛盾与基本问题,对这些基本矛盾和问题的认识贯穿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中,其在内容上是完整的、系统的、科学的,在逻辑体系上是严密的、统一的,具有不可割弃的内在的联系。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各个理论形态各具特色,反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时代性

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各个具体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其产生的国际环境、时代背景、历史条件等不同,虽然它们都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但它们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因时代的不同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这就决定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具体理论成果必然带有特定时代的印迹,折射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时代性。

产生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毛泽东思想,就其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当时世界的主题是革命与战争,就国内历史条件考察,当时我国处于民主革命时期,即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

“三座大山”,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时期,因此,就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来说,在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着重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争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并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着重解决的是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创立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处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国内则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围绕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就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些重大的历史命题,在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以及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并使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

参考文献

- [1][3][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115、111-112、294.
- [2][4]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0-361、374.
-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1-143.
- [6]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8-259.
-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5.
- [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45.
- [10]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
-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2-743.
-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0.
-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 [14]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48.
- [15]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62.
- [16]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646.
- [17]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5.
- [18][1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707.
- [20][美]斯诺.红星照耀中国[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353.
- [21][美]谢伟思.“延安精神”与中国的改革[M].齐欣,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810.
- [22][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554-556.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m's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CHEN Fa-shui

(College of Marxism,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As the universally applicable truth, Marxism is of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o China'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However, Marxism must be combined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reality, which requires the Chinese communists practice the solemn and sacred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cours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generations of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closely combined Marxism with the China's actual situation, and thus Chinese Marxism has come into being. Based on the real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Chinese Marxism adheres to the excellent quality of the Marxist theory, realize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which reflects Chinese Marxism's distinc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hows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arxism's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 Marxism;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

【责任编辑 潘照新】